

《同音背隐音义》书名的拟定及其成书年代*

韩小忙

(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, 陕西 西安 710062)

摘要:《同音背隐音义》是针对此前所称“《音同》(丁种本)背注”这个文献题名而拟定的正式书题。《同音》丁种本是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之一种(俄藏编号X 1),该文献仅存前33页,是一个残本。《同音》丁种本是《同音》乙种本系统(新版)中的一个版本。值得特别指出的是,除两页序言以外,该文献每页正文的背面多有墨书小字注释文字,原来称为“背注”,我们现在改称“背隐音义”。虽然《同音背隐音义》这种著述形式在西夏文献中比较罕见,但是其在六朝以降的汉文文献中却屡见不鲜,如《说文音隐》、《毛诗背隐义》等。由于这种“音义”类注释正好写在某个文献的背面与该字相对应的位置,故名之曰“音隐”、“音义隐”等。

关键词:西夏文献;《同音》丁种本;背隐音义

中图分类号:H211.07

文献标志码:A

文章编号:1002-0292(2011)03-0098-03

一、引子

对未知文献进行定名,素来为作学问的人所向往,如能有一得之见,堪称快哉!近读敦煌学方面的论著,知有“音隐”类著作,如《毛诗音隐》、《说文音隐》等。其特征,正面为一成书,如《毛诗郑笺》,然书中说解未能使人通晓,于是有好事者于卷背为正面文字作解,或注音,或释义,俨然成一家之言。如若将其录出,又成一书,便可名之为“毛诗音隐”。潘重规先生说:“凡此以隐名书,皆颇费解。所谓隐者,特以所著书于卷背,隐而不现,故名为隐,非有他义也。盖谓隐为背,犹谓表为面,表隐亦犹言表里。”^[1]

细思量之,笔者数年来研究之“《同音》丁种本背注”不正是这类著作!正所谓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”,遂成此小文,以就正于方家。

二、《同音背隐音义》书名的拟定

《同音背隐音义》在拟定这个名称之前,是没有书名的。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第7册为正面文献

定题为“《音同》(丁种本)”,因为属于是新发现的文献,故编号为“俄X 1”。《同音背隐音义》由于是在《同音》丁种本的背面,故当时拟题为“背注”,文献编号为“俄X 1 V”。

中国自古以来文献浩如烟海,由此而发展起来的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之学,更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。所谓“注释”,或称“注解”,或单称作“注”,是人们在阅读前人留下来的书籍文字时产生了疑惑,对书上的文字、词语所作的疏导或解释。它的产生,可能因为语言有古今之别,地域之分,雅俗不同,需要明白究竟者予以说明。所以说,自古以来,所谓的“传、注、疏、笺、说、解、释、诂、诂、校、证、考、微、隐、音、音义、章句、集解、集释、训诂、解诂、疏证、义疏、正义”等等,都是不同形式的“注释”。

“音义”类注释,由来已久。它是以经传中文字的读音、含义以及文字的正误为主要注释对象的一种注解形式。这种注释形式的出现,应当与反切注音法的应用关系密切。南北朝时期,为儒

收稿日期:2011-03-20

作者简介:韩小忙(1963-),男,陕西户县人,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,博士研究生导师,主要从事西夏历史、语言文字研究。

*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黑水城西夏文献整理与研究”(项目批准号 10&ZD081);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(项目批准号 200717)。

家众经作“音义”的著述就很多,其形式多样,有单独刊出的,如北周沈重《周礼音》、晋徐邈《毛诗音》;有书之于侧的,如敦煌写本S.5705《周颂》残卷;而书之于卷背的,如梁千氏《毛诗音隐》、佚名《说文音隐》等。到了唐代的陆德明,其所撰《经典释文》博采汉魏六朝以来有关典籍音韵、训诂资料,纂为一书,成为汉魏以来群经音义的总汇。其实“音义”类著作在佛经的注释上也很多。注者往往作音于佛经各卷之中,或书之于侧,或书之于端,或书之于卷末。其后录出结集而成为一部专门的经音,如《大般涅槃经音义》、《佛本行集经音义》等。到后来便形成了《众经音义》、《一切经音义》等集大成的佛学训诂经典著作^[2]。

在中国古代传统文献中,与我们要研究的西夏文《同音》丁种本背面的注释有密切关系的注释类著作,是被冠以“隐”的这类著述,计有“隐义、背隐义、表隐、音隐、音义隐”等不同名称,例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就记载前朝人撰有:《丧服经传隐义》、《毛诗背隐义》、《毛诗表隐》、《毛诗音隐》、《说文音隐》、《礼记音义隐》等^[3]。

所谓“隐”,就是将释义隐于卷背的意义。清人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卷三:“按齐、梁时隐士何胤注书,于卷背书之,谓为隐义。背隐义之义盖如此。由是推寻,则凡称音隐、音义隐之类,大抵皆从卷背录出,皆是前人隐而未发之意。当时别无书名,故即就本书加隐字以明之。”^[4]

以是推之,所以我们将此前所称的“《音同》(丁种本)背注”这个文献题名,改拟为“同音背隐音义”。之所以如此,理由有三:其一,我们称“音义”,而不单称“音”,是因为《同音》丁种本背面的这份注释以释义为主,注音次之;其二,称“隐”,是言明《同音》丁种本背面的注释正好是对正面相应字词的解釋,类似于汉文文献中的“音隐”类著作;其三,称“背”,一是就其注释形式而言,一是与前述所称的“背注”呼应,便于大家理解。

三、《同音背隐音义》的成因及作注者的背景

(一)背隐音义的成因

从背隐音义的内容来看,作注的目的可能是因为《同音》的正文太过简略,不能满足学习或使用的需要,注者便以《同音》正文为基础,参考《文海宝韵》等书的内容,并结合自己所掌握的西夏文知识,在这个《同音》版本的背面进行了补充注释。

(二)背隐音义作者文化背景的推测

背隐音义的作者虽然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,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背隐音义的若干特点,分析考证其所处的文化背景。

1.作背隐音义的人对西夏文化非常熟悉

背隐音义的主要内容是对正文词义的诠释,通过背隐音义完全可以看出,作注者对西夏语文非常熟悉,因为背隐音义中所选的和正文有关的同义词或近义词,对正文这些词给予了相当准确的解释。背隐音义中无论是指出某个名词的用途,还是对某个动作的描写,都相当到位,并且简明扼要。另外,背隐音义中还出现大量的反切注音。如果不是对西夏语相当熟悉或精通,大概不可能给出此等注释的。

2.作背隐音义的人对汉文化亦相当熟悉

同样地,通过背隐音义亦完全可以看出,作注者对汉语亦相当熟悉。因为背隐音义中有大量的汉语对音材料,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番汉语互译等情况,是非常难得的史料。另外,一些反切注音的下面还用汉字“二、三、四”等直接标记该组(纽)同音字的字数。这些均说明了作注者的汉语和汉文化的修养。

总而言之,背隐音义的作者如果不是熟悉西夏文的汉人,那至少也是对汉语相当精通的番人。其作注的目的,很可能是给初通西夏文的汉人看的,或者是给懂一些汉语的西夏人看的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西夏人骨勒茂才在《番汉合时掌中珠》的序言中似乎早已给出了答案:“不学番言,则岂和番人之众;不会汉语,则岂入汉人之数。番有智者,汉人不敬;汉有贤士,番人不崇。若此者,由语言不通故也。”^[5]

四、《同音背隐音义》形成年代的推定

(一)《同音》乙种本的成书年代

《同音》乙种本成书的年代当在公元1176年之前。关于这一点聂夫斯基早已论证过了^[6]。因为在《谚语》的跋尾中,曾记述在乾祐七年(公元1176年)时,番学士梁德养已经将《谚语》大体纂集起来了,然未及彻底完成便不幸亡故。在《同音》乙种本的《同音重校序》中则记述梁德养本人看到过去刊印的《同音》(甲种本即所谓的旧版),书中问题很多,所以他用《文海宝韵》、《手镜》、《集韵》等书对之认真校对,匡正疏失,增加新字,使之成为新的版本。依此推断,新版《同音》应该在梁德养在世时就已经刊印出来了,所以其成书的年代应

该在其去世之前,即公元 1176 年之前。

(二)《同音》丁种本的成书年代

那么《同音》丁种本又是什么时候覆刻的呢?我们认为应该离《同音》乙种本成书的时间不会太远,因为它们大同小异。

所谓“大同”,是指两个版本在绝大多数地方是一致的。通查两个本子前 33 页的内容,仅发现一处大字在笔画上稍有变化。即同音_丁 14B58 大字为“𪛗”,同样位置《同音》乙种本该字左下部“𪛗”的左边写成了“𪛗”,即下边一小画不该出头却写出了头。不过从总体上来看,这种笔误在《同音》各种版本中均经常出现,属于常见现象。举一个最为常见的例子,如“𪛗”字,各版本将“𪛗”的左边写成“𪛗”的情况随处可见,例如同音_甲 06B23(大字)、30B31(注字);同音_乙 07A72(大字)、40B78(注字);同音_丙 26B76(注字)、30B53(注字);同音_丁 07A72(大字)、32A12(注字)。倒是写正确的不多,例如同音_甲 10B44(注字)、42A63(注字);同音_乙 25B78(注字)、35A77(注字);同音_丙 30A44(注字);同音_丁 12A67(注字)、13A37(注字)。

所谓“小异”,是指两个版本在某些注字上稍有变化。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。

1. 字体刻印错误。有 4 处。同音_丁 08A58 注字为“𪛗”,而在《同音》乙种本中该字中部“𪛗”则变成了“𪛗”;同音_丁 29B73 注字为“𪛗”,而在《同音》乙种本则错为“𪛗”。同音_乙 23B65 注字为“𪛗”,而在丁种本则错为“𪛗”;同音_乙 28B11 注字为“𪛗”,而在丁种本该字左部则错为“𪛗”。

2. 笔误。不该出头的出头,该出头的不出头,有 3 处。同音_丁 13B76 注字为“𪛗”,而在《同音》乙种本中该字下部“𪛗”的左边写成了“𪛗”;同音_乙 25B67 注字为“𪛗”,而在丁种本中该字左下部“𪛗”的上面写出了头。同音_乙 23B42 注字为“𪛗”,而在丁种本中该字右下部则成了“𪛗”。

3. 印刷错误。有 4 处。可能是有些笔画刻得

太浅,印刷的次数多了就变得模糊不清,甚或消失了。同音_乙 15B34 注字为“𪛗”,而在丁种本中该字右上部全部变成了一横。同音_乙 15B43 注字为“𪛗”,而在丁种本中该字右上部变成了两横。同音_乙 19A68 注字为“𪛗”,而在丁种本中该字左部上面少了一横。同音_丁 30A23 注字为“𪛗”,《同音》乙种本该字中的“𪛗”不见了。

为什么说《同音》丁种本(包括丙种本)是《同音》乙种本的覆刻本呢?笔者在拙作《西夏文韵书〈同音〉残片的整理》(待刊)一文中已有讨论。不妨转述如下:“从总体上来看,俄藏《同音》丙种本的字体在笔画的清晰程度和运笔方面似乎要优于《同音》乙种本,但是《同音》丙种本多处遗漏分组符号,例如同音_丙 26B73;27A63;27B64;31A33 等处。《同音》丙种本所缺可用《同音》乙、丁种本校补。在字体的相似度以及各个细节上来看,《同音》丙种本更加接近于《同音》丁种本,因为除了上面所举与《同音》乙种本互异的例证之外,凡《同音》丙种本所缺的,《同音》丁种本皆有。也就是说相比《同音》丙种本来说,《同音》丁种本要更为清晰、准确。”

(三)《同音背隐音义》形成的年代

《同音背隐音义》的内容所透露的信息表明,作注者主要参考了旧版《同音》和刻本《文海宝韵》。抄本《文海宝韵》和《同音文海宝韵合编》中有关入声、去声字等内容,背隐音义中根本就没有涉及,所以《同音》丁种本形成的时间应该早于以上二书。

根据《同音》丁种本刊印的年代,结合背隐音义的内容,我们推断《同音背隐音义》形成的年代应该在《同音》丁种本刊印后不久,即公元 12 世纪中晚期。其相对年代应该在《同音》乙种本之后,《文海》抄本和《合编》之前。我们对内容有关联的几部西夏韵书的先后时代排列如下:

《同音》甲种本→《文海》刻本→《同音》乙种本→《同音》丁种本→《文海》抄本→《合编》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潘重规.敦煌毛诗诂训传残卷题记(收入潘氏所著《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》)[M].香港:新亚研究所,1970.
- [2] 郑阿财.论敦煌文献展现的六朝隋唐注释学——以《毛诗音隐》为例[M].敦煌学集刊,2005(4).
- [3] [唐]魏征,等.隋书(卷 32):经籍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3:916-943.
- [4] 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.二十五史补编(4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5:5088.
- [5] [西夏]骨勒茂才撰.黄振华,等,整理.番汉合时掌中珠[M].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1989:5-6.
- [6] [苏]聂夫斯基.西夏语文学:西夏语发音研究的有关资料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7:78-79.

(责任编辑 张玉海)